

值得注意的是，在1913年完工的臺北主要道路並不是種植椰子樹（頁93-94），說明椰子樹在當時並未被廣泛種植。

再者，田代安定先後在1900年和1920年出版兩本著作，以鼓勵種植椰子樹，正正反映了在1920年代以前，在臺灣推行種植椰子樹的活動並不能稱得上成功。作者亦指出田代安定在1920年的著作中，毫不留情地批評日本管治臺灣已二十餘年，但是在行人道兩旁植樹的發展仍相當幼稚（頁74）。但是，作者在第四章充份證明在1930年代的臺灣，隨處可見椰子樹。這帶出一個重要的問題：1920年代，臺灣在政治、文化和經濟上發生怎樣的改變，以致在1930年代，臺灣各地普遍種植椰子樹，使椰子樹成為日本人注視和描述的焦點？這十年間各方面的轉變應該是該書的關鍵，可惜作者對此並沒有深入探討。

讀畢此書，作者不禁問，為甚麼本身亦曾是殖民地的香港，並沒有出現像臺灣類似的情況？在香港十分普遍的鳳凰木（俗稱影樹，學名為 *Delonix regia*），原產地是非洲馬達加斯加，是由英國人引進的植物，然而鳳凰木並沒有改變殖民地時期人們對香港的印象。我們不難發現，殖民地時期最受注目的，仍是具有本土「血脈」的榕樹。在外人描繪香港地方景觀的圖畫中，時常看到的是榕樹而不是鳳凰木。到了今天，香港人仍不時為了道路兩旁的榕樹受人為破壞或天然蟲害，而指責政府對樹木保育不足。另一方面，即使是香港市花洋紫荊，也從來沒有像臺灣的椰子樹般，成為塑造香港景觀的植物。當中顯示了英國殖民政府怎樣的管治理念？這是此書帶給本人的一點啟發。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鄭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2013年，433頁。

《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一書旨在重新評價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在中國抗戰期間，香港仍為英國殖民地，而現時英國殖民地部有關香港的檔案（CO129）已有足夠資料證明大量外國援華物資在1937至1938年間經由香港進入內地。在形勢不利下，日本政府對此曾多次向英國作出交

涉，但英方的回應則表現曖昧。日方遂於1938年空襲廣九鐵路，並且佔領廣州，但日軍並沒有在該年越過深圳河進入香港。對於日本而言，一旦進攻香港，便意味着對英國宣戰，在有所忌諱的情況下，香港保衛戰延至1941年珍珠港事變才爆發。鄺智文及蔡耀倫這本著作，便是重點描述1938年香港在軍援角色褪減以後的備戰和防禦。誠然，英帝國當時並不只擁有香港殖民地，所以其軍事部署必須權衡世界大局及歐洲事態發展，才能作出全面的決定。針對這種原則，作者雖然在書中以大幅篇章交代1938年以後的香港備戰狀況，但仍有兼顧英國軍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軍事部署考慮，所以讀後並沒有抽空香港於國際大環境或誇大事件重要性的感覺，而可讀性亦因其客觀分析而增強。

該書共有七個章節，另有九個附錄，以英國政府的戰略層面作起點，漸次深入至戰術層面分析，並且基本上按時序交代香港保衛戰的進程。第一章主要介紹既有的研究成果、徵引史料的種類和簡單描繪香港自然地理環境。第二章論述英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戰略改變，並且探討這些背景因素如何影響香港防務。第三章描述香港戰役爆發前日本的情報工作、英日兩軍的最終作戰計劃和兩軍動員規模與火力的對比。第四、五章描寫新界與九龍的遲滯作戰和香港島的攻防戰過程。第六章則向讀者交代戰役期間的民間事務。至於第七章則為對戰役的總結，這章節又同時分為英日雙方的戰後檢討和作者的評價。

一般而言，重點描述一事件的著作必須依靠大量原始史料支持，而《孤獨前哨》可謂達到了這種要求。作者使用的檔案，包括了中文、日文和英文材料，例如：陳策將軍日記、日本防衛省研修所戰史室資料、英國戰爭部和殖民地部檔案、英國內閣文書紀錄、香港政府檔案處館藏防衛軍年報和士兵日記等。這一系列的檔案構成了支持作者從宏觀到微觀層面論證的有力證據。該書的突出之處，是引用了上述大量的原始史料，並以實證方式重新考據前人著作的結論，一改英軍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疏於香港防務的觀點。而作者藉這次研究所帶出的另一新論點，是戰爭進行期間所發生的一系列偶然性。

作者指出，1920年代經由英國政府頒佈的「十年規定」(Ten Years Rule) 指示1932年前必須凍結軍費開支增長（頁40），這是英軍設定防衛計劃的最大原則，而《華盛頓條約》亦限制了英國只能維修或替換現有岸防設備，不得增加或新建設施（頁41）。二十年代早期，在以日本作為假想敵時，香港殖民地政府對防衛的觀點是悲觀的，守軍任務下限是阻止敵人使用海港而已

(頁42)。但隨着英國海外及本土防務委員會於1927年提交《武裝海港次序》報告時，指出香港因為保護着英國在華利益和對遠東戰爭異常重要而需優先處理(頁43)。其後駐港英軍司令在防衛計劃書中表示英軍應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盡量增加日軍傷亡為目標。經過多方調整後，駐港英軍最終計劃被調整成「守住香港島」、「阻止日軍使用海港」，而醉酒灣防線亦不是用作長期「阻絕線」，這意味着新界與九龍的戰鬥只是盡量拖延日軍而已。

在討論作者表達的所謂戰爭偶然性前，必須對英軍史略加交代。縱觀英軍歷史，筆者認為英國軍隊堪稱世界上最專業化的軍隊之一。這裡所謂的專業，並不是指軍械裝備先進。相反，卻是指雖然受限於陳舊的裝備、兵員數量的不足，但卻憑藉優良的軍官與士官制度造就成一支精幹的部隊。從以中古時代的平民長弓兵(*Longbow Archery*)剋制法軍騎士，到近代英法聯軍之役期間，英軍在世界各地同時兼顧多場戰役，包括著名的克里米亞戰爭、波斯戰爭和南非卡菲爾戰役等等。祖魯戰爭時，英軍使用制式步槍馬提尼·亨利步槍(*Martini-Henry Rifle*)作戰，槍膛裝彈量每次只有一發，而當地土著使用由德國提供裝彈量達九發的M1871型毛瑟步槍(*Mauser Rifle*)，最後英軍卻獲得了勝利。所以，武器決定論並不適用於英軍研究之中。而《孤獨前哨》的作者亦體會到英軍這種特性，實屬難得。對於香港保衛戰的爆發，香港或國內學者一直認為英軍的抵抗力不堪一擊，然而筆者並不同意這一觀點，這點亦可見於《孤獨前哨》有關新界保衛戰階段的描述中(頁170-174)。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軍第229、230聯隊攻入新界，英軍在當地只有皇家第22工兵連、印度龐遮普營C連、香港防衛軍裝甲車隊執行爆破任務。以英軍編制而言，連級部隊人員規劃約在100人左右，而日軍兩聯隊人數達5,000人之多。面對壓倒性兵力優勢的敵人，處於劣勢的英軍爆破隊仍能爆破從邊界到沙田、元朗的橋梁共三處以上，並且在大埔沿線伏擊日軍達兩次才返回後方陣地。能面對強大敵人而不引起混亂，並繼續執行爆破任務，這充份表現了英軍的專業性，並非外界所指的不堪一擊。而英軍爆破隊的工作成果，亦正如作者所說，阻礙了日軍重型裝備進入香港，間接減輕了後方守軍的壓力。

作者在書中表現出另一特別之處，是向讀者呈現了決定戰爭誰勝誰敗的偶然性，當中例如城門碉堡攻防和黃泥涌峽的正面交火便可見之。英軍在醉酒灣防線佈置了一個營以上的兵力，而且有堅固的機槍碉堡工事，所以日軍在戰前籌組了一支特別攻擊隊，配備火焰發射器對付守軍，攻擊主力是經元朗前進川龍、大帽山等地的230聯隊，但這支部隊最後沒有成為主攻部隊。可是，後來急行軍趕至的228聯隊卻突然在英軍城門陣地前冒出。根據作者

的描述，英軍在日軍228聯隊進攻前曾派出巡邏隊，但時藉大雨，守軍未有發現大量日軍就在附近，而進攻當下，防守的蘇格蘭營第八排正好抽調了半數人員前往巡邏，再加上該排上級連部的通訊員沒有交出連部大門鎖匙予在場另一名士官，以致連指揮部被反鎖，而日軍剛好向該排機場堡的火力死角進行衝鋒，再加上排部在夜間無法組織有效反攻，英軍九龍旅在戰前相關的反攻演習又因日軍提早開戰而被迫取消。這一系列的偶然性，皆迫使英軍提早棄守九龍。在殺傷日軍程度不足下，日軍得以動用更強大的力量進攻香港島，其後的黃泥涌峽戰鬥在很大程度上亦因此而變得更血腥。該戰役同樣地因為一系列偶然性引致英軍的失敗。

在同樣的偶然性下，當日軍在北角登陸時，英軍的確曾對日軍施行逆襲，並對日軍登陸部隊所在地緊縮、包圍（頁227），但日軍藉着壓倒性人數突破了英軍防線，並向南邊的山上推進。當時九龍已經失守，英軍西旅旅長羅遜準將建議把港島守軍的指揮從一旅分割成東、西二旅，緩解指揮部壓力和方便指揮更多的部隊。在此之前，他為了使港島旅電話線保持暢順，於是把西旅旅部由灣仔轉移至黃泥涌，但東西旅分割後，他卻因避免再次遷移旅部引起更大混亂，所以繼續沿用黃泥涌峽位置，但想不到這裡後來是日軍的進攻點（頁233）。最後，當西旅旅部被全滅時，儘管英軍不斷地進行反擊，但日軍已佔盡地形及火炮優勢，這只是垂死掙扎式的抵抗而已。由於作者對這兩場最重要的戰鬥，及至後來淺水灣酒店的戰鬥皆徵引了大量新檔案支持，這使偶然性和運氣影響論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戰爭結果的說法更有根據，亦正如柯文（Paul A. Cohen）在著作《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所表達的史學邏輯相同，不要被後來的歷史結果影響了重塑事件時的建構。

綜合而言，此著作為香港保衛戰提出了一個更具革命性的定論，即英軍當時已盡力防守香港，但欠缺了足夠的運氣把戰役拖延更久，以等待援軍到來。但即使如此，當初英軍司令部的計劃仍在很大程度上獲得實現，例如令日軍付出了重大傷亡才佔領香港，並使對方後來無法把海港使用發揮至最大效能。憑着作者對香港保衛戰的熟練掌握及專業的軍事描述，《孤獨前哨》的內文發展更形生動，可讀性更強。

最後，筆者希望能藉是次閱讀作者成果的機會而略加己見。首先，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及兩軍的迫擊炮配備情況，甚至在照片30中提示讀者注意日軍步兵手持八九式擲彈筒，這無疑是對的，因為香港山多地少，遠程炮火支援最前線部隊攻擊或向守軍提供攔截火炮支援的效果有限，所以能隨最前線部

隊一併行動的小口徑火炮更形重要。如果前線指揮官能即時命令此類小口徑火炮向敵方機槍陣地等具威脅性的目標施行火力壓制，這將可大量減輕部下的傷亡率。而日軍八九式擲彈筒的好處，在於它不需使用迫擊炮底盤，一人攜帶撐扶並交由另一人裝填發射，相反英軍只有到達連級部隊才獲發少量相同武器（口徑較大，而且較重型），這便在部隊接戰時吃盡苦頭。但如為了配合更廣大讀者了解用意，建議作者將來可在著作的更前部份章節中先行描述上述情況。此外，作者在頁89中提及民防條例下提供服務的志願部隊，筆者建議補回香港聖約翰營救傷隊於名單之中，因為該部隊曾於香港保衛戰前越境支援深圳(*Hong Kong Daily Press*, 25th November, 1938: 1)，而且曾有隊員在支援黃泥涌峽時陣亡。最後，筆者亦希望作者在往後的著作中，可對一些單兵裝備的「空門」作更微觀的觀察，從而分析英軍具體作戰時的表現，因為這些臨危而緊張的狀況往往會影響部隊的表現。例如英軍單兵配備的李恩菲爾德步槍四型(Lee Enfield. 303 No. 4)雖然上膛、拋殼動作較日軍暢順而簡潔，但瞄準並非以直線形式進行，這種系統的裝備對訓練不足的步兵而言絕不合適。再者，配發予士官或軍官的湯遜衝鋒槍(Thomson Sub-machine Gun)在1941年時只屬初期配備鼓狀彈箱的版本，在未經修訂下精準度異常差劣。既然《孤獨前哨》一書中曾描述加拿大來福槍營訓練不足，這些小建議或許可帶出一點更新鮮的事件解讀與體會。

嚴智德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王利華，《人竹共生的環境與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415頁。

中國是一個盛產竹子的國度。無論古代現代，竹子在中國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有以竹子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論著出版。何明、廖國強在1994年、1999年和2007年先後出版了《中國竹文化研究》(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竹與雲南民族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中國竹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三本論著，他們的著作注重竹文化的文化學闡釋，從文化史角度述說中國歷史上的竹文化現象。